



引用格式:冯兵,赵一.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研究的进展与思考[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6):12-2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6.00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6-0012-09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Progress and reflection on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Southwest China

冯兵,赵一

FENG Bing,ZHAO Yi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作为西南地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前提,值得学界予以高度关注。目前,对其研究的框架已初步建构,研究方法有所突破,研究视角日趋多样,但也存在研究选题过于集中、史料运用仍需丰富、交叉学科方法亟待提升的缺憾。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西南地区被接受和发展的过程,对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西南地区;
传播;
社会主义建设

[收稿日期]2021-06-28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青年杰出人才培养项目(SKSYL201817);四川大学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重大项目(SKQY201762);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青人才”培育计划项目(SQ2019-MY07)

[作者简介]冯兵(1980—),男,河南省周口市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赵一(1996—),女,河南省焦作市人,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曾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1]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基石,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星火已在中华大地出现,《万国公报》1899年刊载:“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虽然马克思主义凭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研究与宣传在中国很快焕发生机,但其早期传播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包括四川、西藏、贵州和云南在内的西南地区深处内陆,马克思主义在此地的传播,无论是时间的先后还是传播的广度,均远不如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研究从历史阶段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长征时期。梳理归纳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研究,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颇具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传播

随着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看到了救亡图存的新希望,同时也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学界普遍认为,得益于近代以来民主革命运动和民主思想的奠基,五四运动前后是马克思主义在西南传播的起始阶段。由于西南地区地处偏僻,这一时期普遍未对马克思主义有全面且深入的了解与传播,只停留在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初步介绍和进步报刊的宣传

等浅显的层面。但这些介绍和宣传无疑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系统传播埋下了种子,更对西南地区的建党具有奠基性意义。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总体较为零散,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传播概况的历史梳理、传播的媒介与途径等问题。

近代以来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运动促进了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随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道路尝试的失败,西南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突破地理上的局限,引进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徐杨^[2]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以一批外出求学、思想激进的进步知识分子为最早的传播主体,以学校、学会、进步报刊和各类团体组织为主要传播渠道。由于中国社会矛盾尖锐且马克思主义传入的时间有限,此时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内容也明显存在格外关注十月革命和欧美工人运动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缺乏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性认知的倾向性。徐杨将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影响总结为推动西南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促进西南地区群众运动的高涨、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传播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四个方面。匡珊吉^[3]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受限的原因为:国内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弱小、缺乏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条件和思想准备、还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革命成功的先例等,认为四川早期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仅仅局限于简单介绍,甚至存在曲解和误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

五四运动后,随着四川省内《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共产党宣言》等中文译本的迅速传播,研究俄国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党的文章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四川建立党组织打下了思想与社会基

础^[3]。有学者关注了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分期问题。荆德新^[4]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早期传播最迟是在1919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界限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传播方式是《尚志》《滇声》《义声报》等报刊转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报道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相关文章;第二阶段的主要传播方式则是翻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步知识分子组织出版进步性和革命性的刊物。从传播效果上看,后一阶段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些报刊本质上是地方性革命群众组织自办的,编者的理论修养不甚高、所编写的内容存在误差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报刊和创办这些报刊的群众组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作用明显,对我们党主张的宣传、对群众的教育和组织方面所产生的效用应给予重视和肯定^[4]。崔发展等^[5]考察了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四川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情况,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最初传播具备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相继失败迫使四川先进人士寻求新出路的社会基础、近代以来四川爱国民主革命运动洗礼和民主思想传播的思想基础、新式教育发展和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的人才储备。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以成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党组织建立在团组织基础之上、传播内容从盲目逐渐到科学,早期传播从简单介绍到全面发展,培养了一批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骨干群体,促进了四川群众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在川内的大众化进程得到有效推进。

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传播的途径与媒介的研究,学者们多以报纸、书刊作为考察对象。徐源松^[6]对成都的书刊销售处进行了考察。华阳书报流通处引进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报刊图书,《新青年》《晨报副刊》《国民公报》《半月报》等报刊通过这一渠道提升发行

量、扩大影响力。五四运动后,多个新的书刊销售处以学校为依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成都乃至四川的传播。《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等图书亦陆续传到成都。另外,《川报》《四川学生潮》《新空气》《戊午周报》等报刊,也刊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星期评论》等马克思主义进步报刊在云南得到初步传播。为效仿《新青年》、传播新思想,龚自知等人于1917年在昆明创办了《尚志》杂志,宣传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直接激发了云南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和学习,掀起马克思主义在云南传播的热潮。对此,余红^[7]指出,《滇潮》和《曙滇》的创刊是云南新文化运动发展和深入的标志,云南青年努力会和云南革新社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青年努力会会员还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到全省各地出售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并动员云南各界群众行动起来投身国民革命。

对于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传播过程来说,传播主体都是重要一环。研究者对西南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有关注。《贵州青年运动史(1919—1998)》对早期在贵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进行了梳理,强调对贵州青年乃至全国青年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贵州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邓恩铭、周逸群、周达文、王若飞等,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在论及最早在贵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时,提到了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刘方岳、刘松生、严溥泉等留学归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带来的不仅有新的科学知识,还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是贵州青年运动的思想启蒙者^[8]。陈林^[9]在对田君亮的革命活动进行梳理考察后指出,田君亮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贵阳,以学校为阵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要传播内容,有

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贵阳的传播。“九一八”事变后,田君亮在贵阳组织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和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指导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长征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传播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传播经历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原著经典的简单提及甚至与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流派混为一谈,逐步发展为系统科学的传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组织建设相结合并指导革命实践等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学界的视野依旧主要集中于对传播途径和媒介、历史人物活动轨迹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总量较上一阶段丰富,但研究视角仍相对固化、单一。

关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传播的媒介,多数学者关注了报刊图书这一重要的宣传阵地。《广益丛报》《新蜀报》《人声》等均是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通过转载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或译介,或直接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创刊目的,均局部或全面、间接或直接地解释和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现实的互联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赵乐^[10]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理论思想和时弊评论的需要为切入点和推动力,注重在进步学生和青年、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存在部分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清、宣传和阐释过于主观、传播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等不足。李华飞^[11]以《新蜀报》为考察对象,认为《新蜀报》创刊之始就积极投入四川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符合其公开宣布的“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的办报宗旨,中共成立前后和大革命

时期成为四川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面旗帜。苗兴成^[12]认为,作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最早的革命宣传资料之一的《夷经》,利用其通俗易懂、便于记忆的特点,用群众习惯的言语形象生动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张,不仅启发了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悟,还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族、壮族、彝族和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群众起到良好的团结作用。《夷经》做到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唤醒群众,以残酷无情的史实打动群众,以血脉为系、情字为扣感知群众,切实推动了云南民族地区革命的成功,是中共早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政策并用于指导在云南的革命实践的一篇独具地方特色的经典革命文献。

一些学者从中共党组织建立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匡珊吉^[13]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期四川地区一系列专门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革命刊物,认为这些刊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推向了高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四川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一个革命党,因此他们在四川积极建立了中共基层组织。刘声洪^[14]将马克思主义在宜宾的传播同宜宾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进行关联性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宜宾广泛深入传播的主要表现为创建“宜宾青年读书会”、《平民周刊》,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得到扩大;特别重视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注意防止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先进分子开始在工农民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革命先驱对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周祎^[15]考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贵州革命的贡献时认为,

不仅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等革命先驱宣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和大众化,邱醒群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通过课堂宣讲等方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黔籍共产党人在建党后返回贵州开展革命活动,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为广泛。王右木是近些年受到学者关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传播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才是使人类走上自由幸福理想社会的科学主张^[16]。邓寿明^[17]认为,王右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有四点贡献:利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阵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并推动其与学生运动相结合;建立马克思读书会,讲习马列经典著作,组织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团组织;创办《人声报》和马克思读书会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人的革命组织。付春^[18]梳理了王右木创立团组织和党组织的工作:创建团组织,推动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促使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在四川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在工人运动中建立党的组织,推动成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1923年10月,由王右木担任书记的四川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成立,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三、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传播

红军长征经过了贵州、四川、云南和西康等地区,以其受众面积广、影响程度深等特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传播的关键阶段。学界对于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注由来已久,成果较为丰硕,主要集中于对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成效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19]长征时期,中共采取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手段,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这一过程不仅激励了红军将士,同时向长征沿途地区输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中共的政策主张,传播过程呈现出传播方式多样化、艺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等特征^[20]。由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一开始对中共持敌对态度的群众不在少数,为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中共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介绍。毛英等^[21]认为,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输出主要包括:以团结平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最高形式的民族认同观、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实践,马克思主义宗教政策理论、人民民主理论、现代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毛泽东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22]长征的胜利离不开正确的民族政策。周竞红^[23]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民族地区大范围实践,是在红军进入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区,中央机关在直面少数民族社会、处理红军与各民族社会关系和动员各民族群众支援红军的具体问题时实现的,开启中共中央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实践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的研究往往与其传播方式相联系。代维^[24]指出,红军进入甘孜藏区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包括: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与宗教信仰自由和土地革命宣传。以文字、艺术表现形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传播载体和途径,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内涵和实践基础,同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王迁等^[25]认为,红军在长征中一方面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张贴

标语、制定口号、创作文艺作品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为延续革命影响,中共又建立了由当地先进分子与革命群众组成的革命政权和党的组织,实行土地改革,没收恶霸地主财物分给农民。这些作法切实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和影响。周前程^[26]指出,长征途中,毛泽东始终注意对红军尤其是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对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注重在敌对营垒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聂文晶^[27]强调,口头宣传、标语宣传、文艺宣传是红军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方式,而结合实际行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传播中的关键一环。中共通过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减轻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民族地区传播的民族隔阂;通过维护各族群众的切身利益,使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变成了物质的力量;通过发动各族群众包括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与在四川民族地区建立的各级革命政权、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使人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锻炼。王雪燕等^[28]总结了党和红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路径,认为思想觉悟较高、革命信念坚定的党员干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载体,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事业,使党的方针政策“化”到沿途群众中来。另外,理论政策能够真正解决群众实际需要才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认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生动力。长征途中党始终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通过谈心、宣传、教育、全面感染等方式,保证了长征中红军官兵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各级军官和指挥员、普通士兵、沿线群众认识到中共救国救民的决心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认同其主张,坚决拥护其领导^[29]。

关于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传播的媒介,学者们给予了广泛关注,认为最主要的

媒介形式为新闻宣传、歌曲传唱、红色标语等。韩洪泉^[30]从群众路线的视角透视长征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为群众性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典型特征。切实的“身教”之外,还有生动的“言传”,即以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同时印刷了《红星报》《红炉》《红色战场》《战士报》等书刊报纸,传播革命理论,鼓舞军心士气;还积极组织文艺宣传队,通过戏剧、歌舞、快板、诗歌等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针对沿途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对群众的宣传主要采取标语、石刻、群众大会等形式。石刻标语是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媒介。张品良^[31]将石刻木刻媒介传播归类为“时间偏向”的媒介类型,侧重于增强传播的影响力与长久性;书刊报纸则是“空间偏向”类型的传播媒介,侧重于适应战争的游动性与传播的广泛性;红军还注重利用当地语言符号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与通俗性。长征途中红军所宣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过程始终注重广阔地域多民族的传播、注重红军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注重信息的大规模生产,使红军的宣传鼓动效应最大化。柳建辉等^[32]提到了石刻的三种主要形式:石刻文献、石刻标语和石刻对联。石刻的主要内容是三类:动员类,即明确高举马列主义旗帜、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明确革命对象是推翻三座大山、明确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任务等;政策类,即明确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斗争纲领与各项方针政策;第三类为针对群众组织等的标语。石刻灵活多样,直观易懂,便于流传,实现了大众化在形式和内容、静态和动态上的有机结合。陈岗^[33]梳理了红军在川陕苏区运用石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认为石刻标语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渗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的内涵;高度凝练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以本土化和

通俗化特色宣传马克思主义;高度拓展了石刻的表现形式,以多元性和艺术性宣传马克思主义。刘振勇等^[34]以长征时期的红色标语为研究对象,认为红色标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的传播;党和红军通过红色标语,使马克思主义的宣讲和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得到加强,有力引导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化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的拓展与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全面彰显。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5]关于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传播的成效,李单晶等^[36]认为,广大指战员大力播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建立了红军同广大群众的深厚情谊,少数民族群众在扩大红军兵员、筹集粮草、动员民众运输支前等方面均发挥了重大作用。长征中如何在处理党内矛盾、巩固党对红军的领导、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矛盾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党和红军是一个挑战。余永跃等^[37]指出,长征中红军通过军队文艺宣传队和红军官兵通过自身的革命行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队采用“宣传鼓动棚”、快板顺口溜、诗歌等简单适用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确保马克思主义革命火种的传播和长征的胜利。

四、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38]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内陆较早的适应性尝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无疑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长征结束后,为巩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击国民党的反共言论,中共在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地区继续利用进步报刊与文艺活动,同时依托高校社团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抗战时期规模空前的高校内迁使内地教育得以快速发展,对带动迁入地人民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起到很大作用,同时也带去了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39]。

在贵州,秉承遵义会议的精神遗产,借助高校和高素质人才内迁,通过创办书店等渠道,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多方法、多层次的传播系统^[40]。在西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践是同时进行的。由于宗教文化本身的封闭性,加之西藏深处边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是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西藏民主改革前,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传播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就。通过组建基层党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发挥学校、电影和歌曲的功能以拓宽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等方式,确立了各族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使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得到巩固,为西藏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41]。关于马克思主义在西藏传播的分期,徐志民^[42]将20世纪50—70年代的传播分为西藏和平解放前马克思主义与西藏各族人民的有限接触、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前的间接传播、民主改革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的积极传播,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传播高潮四个阶段。王春焕^[43]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传播分为传播和普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至1965年自治区成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初步传播到西藏;第二阶段指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普遍传播到西藏。

统观已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学界长久以来关注的重点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传播的研究呈现以下特征:

其一,当前研究已初步形成一定框架,传播主体、媒介、内容和成效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果。但无论与全国性的宏观论证相比,抑或与华北、华南等区域的中观性研究相较,均显得十分薄弱。其二,研究领域日益多元化,融入了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得到发展,研究深度和广度得以提升。其三,研究视角逐步由宏观论述转向文本解读与个案研究。早期报纸杂志汇编的数字化,使得由文本解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成果增多;一手史料的发掘,为学者从微观视角对具体个案进行探索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体而言,关于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较大,对未来研究的展望至少有以下几点:其一,拓宽研究视野。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主体、媒介、内容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视野集中、话题固化的问题。学者们大多将视线集中在以个别革命先驱为代表的传播主体、以报纸杂志为主要形式的传播媒介上,导致研究成果如出一辙,未能起到丰富研究主题的效果。其二,多元化发掘史料,加深对其文本的研究。文本研究有助于还原历史的原貌,发掘新的研究主题。因此,应提升现有档案史料的利用度。对海外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也是拓宽研究视野的途径之一。另外,《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之类的文献汇编亦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有所助益。其三,进一步探索交叉学科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早期传播的现有研究成果,大多依附于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不利于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突破。借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不仅应引入传播学、社会学、政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还应当原有的历史学研究中突破“革

命史”研究范式,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索运用“现代化”研究范式,以求研究广度和深度的拓展。

参考文献:

- [1]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N]. 人民日报,2018-12-19(01).
- [2] 徐杨. 试论马克思主义在西南的早期传播[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8):50.
- [3] 匡珊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四川建党[J]. 社会科学研究,1981(6):28.
- [4] 荆德新.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云南的早期传播[J]. 思想战线,1986(3):58.
- [5] 崔发展,刘鑫. 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论析[J]. 惠州学院学报,2019(4):39.
- [6] 徐源松. 马克思主义在成都的早期传播[J]. 先锋,2015(6):58.
- [7] 余红. 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传播[N]. 云南日报,2016-07-03(06).
- [8]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贵州省委员会. 贵州青年运动史:1919—1998[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34.
- [9] 陈林,田君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贵阳的宣传者[J]. 贵阳文史,2011(4):12.
- [10] 赵乐. 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J]. 邓小平研究,2019(3):109.
- [11] 李华飞.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新蜀报》[J]. 文史杂志,1991(3):7.
- [12] 苗兴成. 基于《夷经》的视角看王德三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J].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6(3):65.
- [13] 匡珊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四川人民的觉醒[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3.
- [14] 刘声洪. 马克思主义在宜宾传播与中共宜宾地方组织的建立[J]. 四川党史,2001(5):5.
- [15] 周祎. 论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及初步大众化[J]. 法制博览,2015(33):273.

- [16]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 四川大学史稿[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5: 76.
- [17] 邓寿明. 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第一人: 王右木[J]. 四川党史, 2001(3): 32.
- [18] 付春. 王右木: 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先驱者[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1(6): 137.
- [19] 习近平.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0-22(02).
- [20] 武月琴, 郭国祥.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及其当下价值[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6): 20.
- [21] 毛英, 李仁君. 长征时期阿坝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现实意义[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6(6): 12.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1703.
- [23] 周竞红.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6): 13.
- [24] 代维. 试论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在甘孜藏区的传播[J]. 西藏研究, 2018(2): 8.
- [25] 王迁, 王让新. 论长征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与基本启示[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6(5): 105.
- [26] 周前程. 长征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J]. 理论研究, 2017(1): 23.
- [27] 聂文晶. 红军长征与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民族地区的传播[N]. 中国民族报, 2019-02-01(08).
- [28] 王雪燕, 郝建华, 张强. 长征途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及当代启示[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6(3): 100.
- [29] 张小秋. 红军长征中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17(5): 112.
- [30] 韩洪泉. 长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 苏区研究, 2018(4): 80.
- [31] 张品良. 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探析[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5): 83.
- [32] 柳建辉, 高中华.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石刻标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启示[M]// 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第1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170.
- [33] 陈岗.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川陕苏区的实践及启示: 基于红军石刻标语政治文化的视角[J]. 临沂大学学报, 2014(4): 69.
- [34] 刘振勇, 陆霞.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阈下长征红色标语文化的传播分析[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5(6): 6.
- [3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2.
- [36] 李单晶, 罗大明. 红军长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非线性关系探索[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5(3): 96.
- [37] 余永跃, 刘成松. 危机公关视角下的红军长征与马克思主义传播[J]. 教育教学论坛, 2012(2): 64.
- [38]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 人民日报, 2018-08-23(01).
- [39] 裴彦梅, 赵国友.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研究[J]. 党史文苑, 2017(1): 19.
- [40] 刘琼, 叶世才. 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现实意义: 以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为例[J]. 陇东学院学报, 2012(2): 20.
- [41] 徐万发, 刘虹. 西藏民主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践[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 19.
- [42] 徐志民. 马克思主义的西藏传播史研究: 以20世纪50—70年代为中心[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42.
- [43] 王春焕. 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传播、普及和影响[J]. 西藏研究, 2018(2): 5.